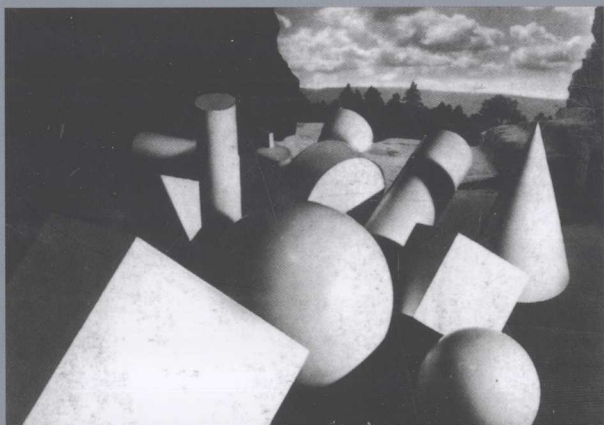


人文科学译丛·主编 汪民安 张云鹏

Politiques de la Nature

Bruno Latour



自然的政治

如何把科学带人民主

〔法〕布鲁诺·拉图尔 著

麦永雄 译

 河南大学出版社
HENAN UNIVERSITY PRESS

Politiques de la Nature

Bruno Latour

自然的政治
如何把科学带人民主

〔法〕布鲁诺·拉图尔 著

麦永雄 译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自然的政治: 如何把科学带入民主 / (法) 拉图尔

(Latour, B.) 著; 麦永雄译. — 郑州: 河南大学出版社, 2015.8

ISBN 978-7-5649-2134-7

I. ①自… II. ①拉… ②麦… III. ①科学社会学

IV. ① G30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5) 第 210499 号

Bruno Latour

Politiques de la Nature

Copyright © Éditions La Découverte, Paris, 1999, 2004

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 2013 by HNU Press

All rights reserved

豫著许可备字 -2015-A-00000395

自然的政治: 如何把科学带入民主

著 者 [法] 布鲁诺·拉图尔

译 者 麦永雄

责任编辑 谭 笑

封面设计 周伟伟

出 版 河南大学出版社

地址: 郑州市郑东新区商务外环中华大厦2401号 邮编: 450046

电话: 0371-86059701 (营销部) 网址: www.hupress.com

制 作 北京大观世纪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印 刷 郑州瑞光印务有限公司

版 次 2016年4月第1版 版 次 2016年4月第1次印刷

开 本 787mm × 1092mm 1/32 印 张 17.375

字 数 269千字 定 价 68.00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河南大学出版社营销部联系调换)

人文科学译丛

主编 汪民安 张云鹏

北京上河卓远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出品

此为试读, 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com

谨献给伊莎贝尔·斯唐热、维西安尼·德普雷
和大卫·韦斯顿

宇宙政治的三位真正的践行者

目录

导论：政治生态学欲将何为？	1
第一章 为何政治生态学必须要放弃自然	17
首先，离开洞穴	19
生态危机还是客观性危机？	34
自然的终结	51
自然的“社会表征”的陷阱	65
比较人类学的脆弱帮助	82
什么是两院制集体的继任者？	97
第二章 如何聚合集体	104
召集集体的困难	111
第一分野：学会慎重地与代言人相处	121
第二分野：人类与非人类的联系	138
人类与非人类的第三分野：现实与抗拒	151
一种或多或少衔接的集体	160
回归国内和平	169
第三章 新分权	175
事实与价值概念的某些弊端	181
考量权与排序权	195

集体的两种表征权力	208
核实基本保障得以维系	220
一种新的外部性	228
第四章 集体的技能	240
第三自然与两种“生态”科学之间的争执	245
两院程序的专业贡献	258
两院的工作	309
共同栖居,“欧依寇斯”(Oikos)	339
第五章 探索共同世界	344
两个时间箭头	351
学习曲线	363
第三权力与国家问题	374
外交练习	391
复数科学的战争与和平	409
结语:欲将何为?政治生态学!	416
论点总结	429
术语汇编	437
参考文献	461
索引	488
中英文译名对照表	511
译后记	523

政治生态学欲将何为？无为。欲将何为？政治生态学！

鉴于注意到所谓的“绿色”运动停滞不前，所有那些希望自然政治能够带来公共生活的新面貌的人，一直在追问第一个问题。他们很想弄明白，为何如此充满希望的努力竟然往往会一事无成。情况尽管如此，每一个人还是必须要照样回答第二个问题。我们没有选择：政治并非是井然有序地落在分水岭的这一边，而自然则在另一边。自从“政治”一词创造出来，所有类型的政治都为其与自然的联系所界定，它们所有的特征、属性和功能皆依赖于那种惹起争端的意图，即对公共生活加以限制、改革、建构、缩短或启蒙的意图。因此，虽然我们无法选择是否参与政治生态学，但是我们却能够通过区分自然的问题与政治

的问题，选择是否隐秘地参与其中，抑或明确地把这两类问题作为摆在所有集体面前的一个议题来处理。当生态运动告诉我们自然正在急遽地侵入政治时，我们应该想象——通常是把我们与这些运动结盟，但有时也反对它们——何种政治能够最终摆脱类似于我们称为自然的那把达摩克利斯之剑。

批评家们会认为政治生态学已然存在。他们会告诉我们，它具有无数细微的差别，从最深刻的到最肤浅的，包括一切乌托邦的、理性的，或自由市场的可能形式。无论我们可能对它们有什么样的保留意见，这些运动早已在自然与政治之间编织了千丝万缕的联系。确实，这正是他们全部宣布要去做的事情：为了重视自然且最终要承诺自然政治；最终要修改公共生活；最终要使我们的生产系统适合于自然的需要；最终要通过某种可持续的政治来保护自然，避免人类退化。概言之，对自然的关注通过众多往往是含糊而有时是矛盾的伪饰，早已经导入了政治生活。

我何以能够声称这是一项新任务，一项尚未大张旗鼓议论过的任务？人们可能会争辩其有效性，可能驳难它的应用性，但是，我们无法显得仿佛这项任务尚未为人所关注，仿佛它尚未在相

当大的程度上已经得以实现那样。倘若政治生态学被弄得这样令人沮丧，那么这并不是因为没有人曾试图让自然在公共生活领域占有一席之地。倘若按照某些人的看法，认为政治生态学正在失去影响力，那么，这仅仅是因为反对它的那些利益过于强大；而在另一些人看来，这是因为政治生态学像往常一样，从来就没有足够的实体去与由来已久的政治实践进行抗争。无论如何，重新开启这项议题为时已晚。我们要么在充斥着旧式意识形态的墓地埋葬这个运动，否则，我们就需要更勇敢地继续战斗，确保这项运动会以其现有的形式获取胜利。无论是哪一种情况，骰子已经掷下，其概念已经界定，各自的立场也众所周知。对于一场术语已经具体化的争辩而言，你显得到场太晚了。反思的时间已然流逝。你应该十年前就说出这番话。

在本书中，我想应该提出一种不同的假设来为我不合时宜的介入辩护。从概念的意义上说，政治生态学尚未开始存在。人们一直是把“生态学”和“政治”这些词语加以简单的并置而没有透彻地反思其中任何一个术语；因此，迄今我们无法从生态运动的发展中得出任何结论，无论是它们昔日的失败，还是其可能成功的实验。这

种遭到耽搁的原因很简单。为了建立一种政治生态学的权利与模式，人们太容易相信，它足以把毫无变化的自然与政治的旧概念回收利用。然而，只要不是把欧依寇斯（oikos，栖居）、逻各斯（logos，理性）、菲希斯（phusis，自然）和波利斯（polis，城邦）这四个概念同时运用，它们就

- 3 仍然是真正难解的谜题。政治生态学者曾经假设，他们可以省掉这种概念工作，不顾自然与政治的观念经历了数个世纪的发展，已经可以用这样一种方式将这两个不可能融冷的术语加以任何并置、任何综合、任何排列组合。而更为严重的是，他们曾经以一种普世幻觉的热情宣布，已经“超越了”人与物、法律主体与科学客体之间旧有的区分——并没有注意到这些实体一直在以这样的方式被塑形、勾画和雕琢，以至于它们已经逐渐变得不能和谐相处了。

为了尽快地找到疗救危机的良方，政治生态学家们应当做的事情远非是去“超越”人类与自然、主体与客体、生产方式与环境之间的两分法，而是减缓这项运动，悠着点儿，然后像谚语中的老鼯鼠那样，在两分法的下面挖掘洞穴。这至少是我的论点。我打算要用众多不同的方式松解戈尔迪之结（the Gordian knot），而不是快刀斩

乱麻地解决难题。为了把它们有所不同地缠结回来，我先要解开其少量绳结。凡是与科学的政治哲学有关的，人们都必须缓着点儿，以免遭受失败。当生态学家们提出他们“全球思考，本土行动”的口号时，他们有点儿过于仓促地自鸣得意了。就“全球思考”而言，他们并没有提出更好的东西，自然早就被加以营构，已被总体化，已被制定成为中性的政治。为了真正地进行“全球”款式的思考，他们需要以发现这些机制为开端，正是由于这些机制，全球主义才依次建立起一个个阶段。而自然，正如我们所知，自身几乎没有为该过程增添丁点儿效果的东西。

确实，在本书中，我们将要像寓言中的乌龟那样前进；而像乌龟那样，或至少是我所希望的那样，我们就应该终止超越兔子的目标，这种兔子以其大智慧认定政治生态学是一种过时的问题，已经死亡并被加以埋葬，无法产生思想，不能为道德、认识论和民主提供一种新的基础——同样的兔子曾经宣称要以伟大的几步飞跃来“调谐人类与自然”。为了迫使我们自己缓下来，我们需要共时性地处理科学、自然、政治的多元问题。

科学生产：这是我们沿途会遇到的第一个障碍。政治生态学据称是关涉于“与社会相联系的

- 4 自然”。这确实不错。但是经由科学的中介，这种自然却变成了可知之物；它通过工具网络而被赋形；通过专业、学科和议定书的干预，它被加以界定；它经由数据库而分配；它通过学术团体的介入而有了争论。生态学 (Ecology)，正如其名所示，本身并不直接进入自然；它像所有科学的学科一样，是一种“学” (-logy)。于是，我们在科学的头衔之下发现了一种颇为复杂的证明和论证工作者的混合体，一种作为第三方与社会有着千丝万缕联系的学术团体。而为了确切地加速其激进运动的进程，生态运动往往寻求缩减这种第三方的作用。在他们看来，科学仍然是世界的一面镜子，在某种程度上，人们在他们的文献资料中，几乎总是能够把“自然”与“科学”这两个术语视为同义词。^[1] 与此相反，我的设想是科学生

[1] 指出这一点是令人惊讶的，生态运动所提出的大部分问题都完全取决于它们具有清晰度的科学，而这一规则的例外仍然为数不多。例如，我们可能会想到温室效应，或者鲸目动物的逐渐消失；无论如何，学术性的学科最终会走上前线，这不同于其他社会运动的情况。我们在瑟奇·莫斯科维奇 (1977[1968]) 那里，找到了一个例外，一个格外珍贵的例外，因为这本书是 30 多年前撰写的。不过，米歇尔·塞尔 (1995) 那部影响深远的著作是一个佳例，它从一种结合了法律和科学的人类学立场，在聚焦于科学的质疑与针对生态学的质疑之间建立了最密 (转下页)

产之谜必须在政治生态学的核心重新加以定位。虽然这样做，很可能会减缓获得本来应是政治斗争杠杆的确定性过程，但是在自然与社会之间，我们应当涵括这种第三方术语，它所扮演的角色将会证明是极为关键的。

自然是政治生态学沿途会遇到的第二个减震路障。有人会反对说，自然何以能够给一系列激进的科学学科带来不便？这些学科势必密切相关于这种途径：保护自然，为自然辩解，把自然嵌入政治游戏，使之成为美学对象，成为法律主体，或无论怎样都成为一种关注。而这就是困难所在。每一次我们试图将科学事实与美学、政治、经济和道德价值糅杂在一起的时候，我们就发现自己不知所措。倘若我们过分容纳事实，那么以其整体性呈现的人文元素就会向客观性倾斜，变成了一种可数、可计算的事物，一种力量维度的底线，

（接上页）切的联系。本书在塞尔对科学的契约功能推进方面，进行了一些拓展。乌尔里奇·贝克（1997）在一本书中也常常暗示科学的社会学，正如皮埃尔·拉斯库姆（1994）所做的那样，该书对于拙著而言特别重要。此外，除了有些关于公众参与的著述之外（欧文和怀恩，1996；拉什、撒泽尔任斯基和怀恩，1996），生态学与科学研究之间的交叉成果仍然保持着惊人的零星状态。不过，我们幸好还有史蒂文·耶利（1991）、克劳斯·埃德（1996）和乔治·罗伯逊（1996）。

芸芸众生中的一个物种。如果我们过分容纳价值，那么自然的一切都会倾向于变成神话般的不确定性，变成诗歌与浪漫主义；万物皆变成了灵魂与精神。倘若我们将事实与价值混合，结果会更糟糕，因为我们正在剥夺自己的两样东西：自律的知识与自主的道德。譬如，我们永远都不应该弄明白激进的生态学家用来吓唬我们的那些启示录般的预言是否掩盖了科学家留传给政治家的权力，抑或主流政治家用来控制可怜的科学家的权力。

- 5 本书详细地阐发了政治生态学与“自然”——那种希腊政治学、法国笛卡尔哲学和美国公园的混合体——毫不相干的设想。且让我坦言：政治生态学与自然毫不相干。甚至还可以更加强调地说，在其短暂的历史上，政治生态学决不曾与自然，与其防御或保护有关系。正如我将在第一章所展示的那样，那种认为政治生态学具有自然旨趣的想法是这一领域的幼稚病症，这是通过阻碍它弄明白其自身实践，使之处于一种软弱无力的状态。我希望，这个断奶的过程，即便是有点儿残酷，也会比强力维持作为政治生态学的单独对象的自然观更有喜人的良效。

第三，最麻烦、最具有争议性的障碍显然来自于政治。我们知道科学的生态学与政治的生态

学之间的差异，生态学的学生与生态运动的斗士之间的区别。我们也明白生态运动总想在政治棋局中找到一席之地有多么困难。站在右翼一边？左翼？极右派？极左派？既非右翼亦非左翼？另觅他处，政府？无处可寻，乌托邦？在上面，技术专家治国论？在下面，回归智慧之源？超越，充分地自我实现？无处不在，恰如美丽动人的盖娅假设所提示的那样，设定一个包罗万象的地球，用某种单元有机论把所有的生态体系统合在一起？虽然可以有一种盖娅科学，一种盖娅迷信，但是，可否有一种盖娅政治？如果我们要为地球母亲盖娅进行有力的辩护，这是一种政治吗？倘若我们的目标是要终止噪音污染，完全关闭城市垃圾场，减少排气管废气，那么这确实不值得竭尽全力去进行努力：内阁部长会负责此事。我的假设是，生态运动一直在寻求把自己安置在政治棋局中，可是却没有重新画出它的方格，没有重新界定游戏规则，也没有重新设计兵卒。

实际上无法证明，人类政治与物质科学之间、自由要求与必然权力之间的劳动分工能够作如此之用，以便让政治生态学有安身立命之地。甚至有必要假设，除了要用自然必要性的法则来限制它之外，人类的政治自由从来就没有得到界定。